

巨笔书写激情洋溢壮丽诗篇

——学习《习近平在正定》

□吕永志

种植结构得以调整，农民人均收入因此从148元提高到400多元，一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看到县城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街道污水横流，生活垃圾随处乱丢，群众生活环境受到很大影响，他强调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不能搞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再落个“高产脏县”的名声。他组织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在县城修建37个垃圾池、11个公共厕所，建立13个乡镇文化站、45个农村俱乐部，为71个村安上自来水。为解决西兆通“奶牛村”群众卖牛奶难问题，他请求当时没有隶属关系的石家庄市的市委书记帮助协调在村里建起收奶站。1983年10月，听说南牛公社南水固村小学因校舍漏雨，学生被迫停课，他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南牛公社党委从南水固村小学办学条件问题中看到与党的要求的差距，迅速采取措施改善办学条件；了解到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房子露天、窗户没玻璃，就把公社书记叫到办公室，进行严肃批评：“里双店搞‘大包干’不错，但不能一俊遮百丑，教育抓不上去，改善办学条件不力，那你也不是一个好书记。”

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呈现的敢做善为的创新精神，突显出他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早已融入红色血脉。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时，适逢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开拓创新成为时代潮流。他常说“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守旧未必风平浪静”，强调改革要体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真意。针对正定处在城市和农村过渡地带的区位特点，他大胆提出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大搞农工商，把正定经济带入快车道。针对“干不干，八分半”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实际，他摆脱“中央没文件，河北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的束缚，冒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危险，向县委提出仿照安徽和四川等地的做法，开展“大包干”试点，试点公社当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半。他敢于和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改作风，主持制定“正定六项规定”，用以规范干部言行，要求干部必须总揽全局，抓大事；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好“三会一课”，解决好领导班子自身组织生活不正常、涣散软弱问题；要求党员对照党章要求，对照先进党员、英雄模范，对照入党誓词，反思思想上行动上的差距和不足；果断决定对落后党组织进行整顿，对不合格党员进行清理。强调对党员干部要开展好党性教育、方针政策教育、先锋模范作用教育“三项教育”，领导班子要切实解决好政治路线政治立场问题、为人民服务不到位问题、政治生活不健全问题、领导班子涣散问题“四大问题”，为干部教育和领导班子建设指明

了方向。

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呈现的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思路理念，突显出他求真务实抓落实的严实作风。从从政初期就早已成型定格。“做事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很多正定人对总书记的褒扬。在正定工作期间，他大力倡导“人才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亲自主持制定“正定人才九条”，提出：凡是来正定的科技人员，搞成项目，利润按比例分成或拨付一次性报酬；凡有技术专长的，一定接收，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用付；凡到正定讲学的专家、学者、教授，车接车送，并发津贴。为了挽救县油泵油嘴厂，他专程登门拜访，聘请无锡某公司原经理担任厂长，当年实现产值翻番。为了争得爽脚粉项目落户正定，他连夜骑行数十里赶往石家庄，喊遍谈固小区几十栋家属楼，寻访项目持有人，投产不到一年，就赚得纯利润30多万元。他轻车简从深入实地调研，因势利导改造“连茅圈”，协调开通市县公交线路，实行教师聘任制，破除家庭成分论，组织举办群众体育运动会等，都成为惠民生、顺民意、深得干部群众交口称赞、影响正定长远发展的实事好事。

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呈现的“习以为苦”“勤以为常”的自我修养，突显出“勤以修身、俭以养德”的中华传统美德早已浸透他勤朴清廉的政治品格。习近平同志从小就接受春雨一样革命家风的熏陶，不仅在生活上“习以为苦”、工作上“勤以为常”，而且学习上“孜孜以求”。他自觉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向书本学习知识、向实践学习真知、向历史学习经验、向群众学习智慧，成就了他学富五车的远见卓识。他习惯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食堂“大锅饭”，一起蹲在树下吃饭聊天，总是骑着自行车往乡下跑，深入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干、一块苦、一同过”。他苦以励志，一间10多平方米的宿舍室，一张三屉桌，一个文件柜，一双木板凳，一张木板床，一个脸盆架，一个暖水瓶，一只白炽灯，异常简陋的办公条件，展现了总书记一生崇尚简朴的高尚生活方式。“从思想修养到行为遵循，从工作作风到群众关系，他都不折不扣地履行了作为领导干部的职责，做到做人唯正、做官唯民、做事唯实、思想观念唯新”——从正定人的评价中，能够深切体会出总书记作为一代伟人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艰苦奋斗的优秀品格。

习近平同志把正定称为“第二故乡”。其间，他广交朋友，与很多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离开正定以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曾经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事和战友，先后6次返回正定，看望故交和乡亲。他与吕玉兰、贾大山的友谊传为美谈。他始终关怀和支持正定经济社会发展 and 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被正定干部群众称为“正定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也是值得我们一生永远爱戴、学无止境的好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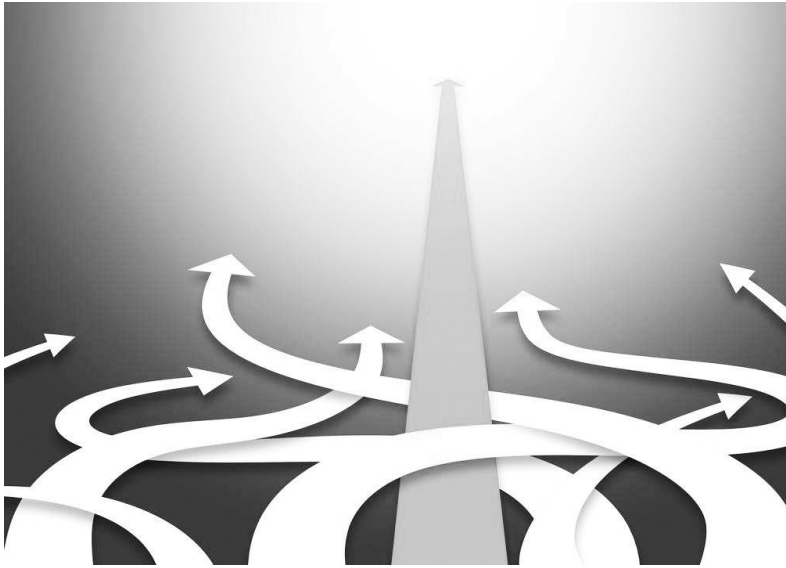
在挑战中把握机遇

□顾伯冲



公元前246年，也就是秦王嬴政上台执政的第一年，东邻韩国派一名叫郑国的水工入秦献策修渠，以此消耗秦人力财力，使之无力吞并六国。就在水渠快要修成之际，秦国发现了郑国的身份及韩国借修渠企图在经济上拖垮秦国的“疲秦”阴谋。于是，秦王大怒，发出逐客令，下令限期将所有外来宾客驱逐出境。当时李斯上奏了一篇著名的《谏逐客书》，指出逐客的危险结果，后被秦王采纳。《史记·河渠书》记载：“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折合110万亩)，收皆亩一钟(折合100公斤)，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韩国的“疲秦”之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挑战，后被秦国运用反而成了机遇。这个故事说明了挑战与机遇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键是要善于从哲学层面上把握问题，厘清彼此间的辩证关系，使之此消彼长、逆势而上、行稳致远。纵观古今，“机遇”可谓解读历史进程的一把钥匙。围绕机遇，世界各国演绎出一幕幕兴衰活剧。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维护、用好和延长这个战略机遇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也是抢抓机遇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握挑战与机遇的辩证关系，深谙“弹钢琴”的艺术，千万不能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作绝对的选择。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二选一的



绝对思维方式恰恰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只手。

挑战与机遇总是作为过程而存在和发展的。任何性质的挑战，大至战略、小到琐事，都是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一种反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样，机遇也是通过人为的或自然的外在条件的作用，因时而生、因势而生。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无数有限的具体过程构成无限的永恒发展的世界。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从范围上可分为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从特征可分为可预见和不可预见。这是我国伴随着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过之“坎”。同时，这些重大挑战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孕育着被化解和遏制的机遇。

挑战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机遇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偶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在种种偶然性的过程中都包含着必然的东西，就像人与人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样。挑战与机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又可相互转化。挑战如果应对得当，就会变成机遇；机遇如果不能抓住，就会变成挑战。二者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前所未有的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但我们受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特别

是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稳定程度，让很多外国朋友对中国产生了“两个惊叹”。“风景这边独好”的偶然性来自于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性。必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着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而偶然性则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从属地位，只能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偶然性的概率有多高，取决于必然性的因素有多大。古人有云：“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机遇并不常有、机遇来之不易、机遇稍纵即逝。无论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单位、一个人，谁能慧眼发现机遇、大力创造机遇、有效把握机遇、成功驾驭机遇，谁就能实现跨越发展、升级蝶变。

既要认识挑战的量与质，更要把握机遇的度。客观世界的一切过程都是受因果关系统约的，在影响事物运动变化的诸因素中，有本质的原因和数量的原因两只看不见的“手”，但这两只手如同左手和右手一样，是有所区别的。本质因素这只手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决定着该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只能以唯一的方式存在并以唯一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而量的因素这只手则不同，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量，在一定限度、一定范围内，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到事物质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质的变化是化学性的变化，而量的变化则是物理性的变化。培根说过，只有愚者才等待机会，而智者则造就机会。对于这些重大挑战，一方面要从量上认识其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另一方面从质上判明其性质、要素、特点、规律。质与量的统一就是度，正视挑战、把握机遇，既有质又有量，度是质与量的统一体。把握好机遇这个度，还要善于把握挑战的量变与质变的客观进程，不能主观主义地去超越或滞后它发展变化的度，否则还没有来得及创造历史就成为了历史。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在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如何在形势发展中抢抓机遇，在风险挑战中创造机遇，赢得主动、优势和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具备哲学的眼光、思维和方法。任何深邃的洞察和强大的把控力，都是哲学精神的皈依，这种来自岁月纵深的文化，是作为一种精神整体发出巨大力量的，也是治国理政经验的结晶。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以及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斗争中，对党的纯洁性尤其是组织上的纯洁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些思想对我们党的组织纯洁性建设仍有重要启示。

为什么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纯洁

党的性质是一个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判别一个政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极其重要。正如马克思1860年2月在致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所说，“我们的党在这个19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暇而出类拔萃”。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日起就给予了充分关注，始终把保持党的纯洁放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中之重。早在1847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就曾说道，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对于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保持纯洁，恩格斯1871年9月在谈到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时，曾将其归结为不同的政党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党的纯洁性是植根于政党的阶级性而反映党作为何种政党的显著标志。要确保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

□徐雷

无产阶级政党不变质，就要始终作为群众的“代言人”，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保证组织的成员来自于人民群众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要使得组织在吸纳和评价党员，以及开展活动时着眼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

严把入口

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列举了社会大众要成为盟员所应满足的一些条件，强调当事人的生活与活动方式要符合同盟的要求，要信仰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革命毅力，不参加任何反对共产主义的的政治的或民族的组织等。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对吸收党员条件的第一次明确规定。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对支部吸纳会员的责任进行了说明，要求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中重申，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须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在可疑的情况

畅通出口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号召巴黎的共产主义者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使错误思想在各支部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格律恩的信徒和蒲鲁东的信徒坚持他们的原则，那么只要他们还是正直的人，他们就应该退出同盟而单独行动。这是因为在共产

主义的同盟中只能有共产主义者。在如何对待党内的非共产主义者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态度鲜明——“必须退出”。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2条中不仅提出了要成为盟员的7个条件，还强调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第37条再次主张这一要求，指出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视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1873年6月，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谈到，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而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1879年8月，恩格斯又和马克思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这是因为一个政党如果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那么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组织上的纯洁性，就要畅通出口，及时将不符合党员标准、危害党的事业的分子清除出党。

开展必要的过程斗争

1878年10月，德国俾斯麦政府实施了《反社会党人法》，面对这一不利状况，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逃到瑞士苏黎世（即后来马克思称之为的苏黎世“三人团”），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他们在文章中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改变性质，放弃阶级斗争，说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浅薄的”“粗野的”“偏执的”。他们倾向于采取调和的态度，提出社会民主党应由片面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吸纳“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党”等等。针对这些机会主义观点，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写了封通告信，批评“三人团”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强调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他们组成资产阶级政党，那么是可以的，但是在工人党内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机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就成为了“冒牌分子”，必须要与他们开展斗争。1882年10月，恩格斯在两封信

中，先后总结了法国工人党斗争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决定了斗争甚至是比团结还更为重要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做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做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十分烦恼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无产阶级不能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纲领丢开不管。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斗争，是建立在党内成员地位平等的基础上，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之温顺态度。对这两位革命导师来说，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组织上的纯洁性，斗争不可避免，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共产主义者要随时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